文化景址（六）

图什业图亲王敖包

敖包是蒙古大草原上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建筑物，作为千百年来蒙古民族祭祀山神、路神的图腾崇拜和祈祷丰衣足食、幸福平安的精神依赖，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位置。弥足珍贵的“敖包文化”作为人类草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国际文化大家庭中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遗存。

坐落于吉林省西部、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毗邻的通榆县敖包屯南搏格达召（圣坨子）的古代敖包，即科尔沁部图什业图亲王及其族人历代祭祀的敖包，它背依霍林河，面向大草原，雄踞高岗，五颜六色的神幡凌空飘扬，虎守鹰瞰科尔沁万顷碧野、纵览八百里瀚海的气势，令人望而生畏，历来就是蒙汉民族共同虔诚祭拜的圣地并享有科尔沁大草原上“第一敖包”的美誉。

图什业图亲王敖包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公元1636年，即皇太极登基的第十个年头，天聪大帝改元崇德，昭告天下。在分叙蒙古王公战功时，赐封科尔沁部图什业图汗奥巴的长子巴达礼为和硕图什业图亲王，掌蒙古科尔沁部右翼中旗事。赐予图什业图亲王的爵位之高、俸禄之厚，在清朝当时统治下的蒙古王公大臣中可谓不多。为光宗耀祖，巴达礼在红袍加身衣锦还乡后，即按萨满教规，踏查选址，最终在今王府东部的位置上建起了这座敖包。从此所部无论大祭小祭，都要来此一聚，埋哈达、撒五谷、添石插柳、补系经幡、跪奠先祖、拜祭神灵、祈求庇佑，足见该敖包在当时的科尔沁草原广大臣民中具有多么显赫和崇高的地位。

但遗憾的是，因图什业图王族衰败，该敖包亦随之日渐冷清而年久失修，后来仅残存下遗址。

2012年4月，当年出生在这座敖包山下的蒙古族老干部喜著（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原市委书记），不顾八十高龄，带领额尔敦（兴安盟科右前旗委原书记）、宝山（兴安盟工商行干部），远来寻根。他在敖包遗址前缓步流连，感慨万端，与同行的额尔敦和宝山取得共识，决定筹资对敖包进行抢救修复。他们来到故乡所在地通榆县，表达了复建敖包的愿望。喜著的想法得到了中共通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其后，喜著筹资五万元，购置建材，雇佣人力，于2012年7月23日在同发牧场动工。7月30日，修复科尔沁和硕图什业图亲王敖包的整体工程即告竣。同年10月20日，通榆县举行了由县内各界人士参加的科尔沁图什业图亲王敖包复建落成庆典，并成立了通榆县敖包协会。图什业图亲王敖包的修复，不仅使附近一带的蒙古族同胞又有了每年一度的祭祀之处，也因其在历史上的崇高名望，重又成为一处适合四季旅游的人文景观。

（白城市文联供稿）

B 白城记忆

图什业图亲王敖包

走近古文字（上）——形的演变

为什么要想象？想虎想马不行吗？

●熊建

初夏的一天，我沿着北京的北海骑车。在老城区的许多地方，房屋建在高出马路的台阶上，孩子们坐在外边写作业，老人缝衣服等等。

在房子的外面有人修了特别好看的小花圃，和双人床差不多大小。玫瑰飘香，蔓生植物爬向屋顶。在架子上有仙人掌和兰花，还种着几盆青蒜。一家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吃晚饭，我跳下车，和他们谈论起花。

“是谁修了这个花圃？”我问。

男人自豪地笑了，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我。

这是瑞典学者林西莉上世纪留学北京时的一个经历。她通过这个生活片段引申出对汉字“自”的理解。

表示我、自己的意思时，“我们瑞典人可能会轻轻拍拍自己的胸脯，但中国人恰恰是指着鼻子。”林西莉说，因为汉字的“自”这个字的来源是“鼻”，最初的字形是一个鼻子的正面图，有鼻翼和鼻梁。

这说明，文字的产生，很自然，本于生活，起自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

正如学者唐兰所说，上古的人类先是绘画，内容大概是动物跟人像。随着社会发展，居处安定，国家产生，战争频仍，交通繁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许多歧异的语言混合成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在这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只老虎，任何人见了都会叫做“虎”。有了图画，加上了统一的语言，空气、土壤都具备了，文字就发芽了。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而这个结合体不是固定不变的。字形从繁到简，字音从轻到浊，字义从此到彼，在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流转不居的。尤其字形的变化，最直观，很多字的字形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今天的“为”字，在甲骨文里，是一只手牵着大象的鼻子。为啥这么写？还是来自生活。

以前小学课本里有《黄河象》这篇文章，以化石为例证明几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大象很多。人们驯服它们去干活。“为”字本意就是干活、作为。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象群离开了，人们很想它们，于是就有了想象这个词。

再看“为”字。到了商周铜器铭文里，“为”字里的象已经简化得不太像大象了，手也变成了爪；战国时期，很多“为”字把象的躯干部分省去，只剩下头部；到了小篆，到了隶书，到了楷书，不断演化，变成繁体的“為”字；最后简化成“为”字。

字形演化的过程，刚开始总是很细微的，不易察觉。笔画肥一点、瘦一些，长一点、短一些，这儿加几笔、那儿减几笔，每次一点小变化，时间一久，经过若干人、若干年的摹仿和改易，差别就明显起来，变成一种新体了。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闹笑话。清代小说《谐铎》里有个人就说了，仓颉造字造错了吧？比如“射”字，有寸、有身，分明是“矮”的意思；“矮”字里有委、有矢，才应该是“射”呀。

殊不知，射也好、矮也罢，分别经历了很多演变，才变成今天的样子，不能拿今天的字形来说昨天的意义。拿着旧船票是无论如何也登不上新客船的。

古书今读

勤为人之本

●马军

“勤”字为人生要义。

我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后面的话。后面两句是“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出自明朝《增广贤文》。古代戏曲《白兔记·牧牛》则说：“春若不耕，秋无所望；寅若不起，日无所办；少若不勤，老无所归。”一个勤字，道尽兴旺发达、持盈保泰之道。

“勤”字，左“堇”，为黏土；右“力”，为筋，属六书中的形声字。《说文解字》云：“勤，劳也。从力、堇声。”古人为注，或曰“勤者，劳力也”；或曰“勤，苦也”。可见，勤的本意就是做事不怕辛劳，不惜汗水，埋头苦干，持之以恒。由此可知，有勤万事可期。反之，则一事无成。

古人对此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唐代文学家韩愈这样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告诫莘莘学子，如果想要攀登知识的山峰，那勤奋就是成功登顶的唯一路径；如果想在无际的知识海洋里做弄潮儿，也只有勤苦力学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

宋真宗赵恒也有一首著名的《劝学诗》，他用极简的笔墨道出读书的诸多好处，虽然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也未必有颜如玉，但读书本身便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有志男儿，不论人生理想是什么，总是要先向书中求索一番，因此便有了战国苏秦锥刺股、西汉孙敬头悬梁、西汉匡衡凿壁偷光、晋代车胤和孙康囊萤映雪苦读不辍的典故流传千年。

勤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师，能将一切看似绝无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

勤能补拙。曾国藩本是一个资质不甚出奇的平常人，曾有一个关于他读书不敏的故事，流传颇广。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晚，十来岁的曾国藩在书房中背诵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恰有一小偷潜入房中，附在房梁上等他背完下手，哪知曾国藩背了一晚上还没背下来，倒是小偷却背下来了，可见曾国藩资质平常。

但曾国藩却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其中关键就在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曾任职于曾国藩湘军总办营务处、光绪年间升任闽浙总督的何璟评价曾国藩“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极好诠释了曾国藩以勤补拙、以勤大成的秘诀和根由。

勤能兴家。中国古代著名的治家经典《朱子家训》开篇即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每天晨曦初露就要起床，先用水来洒湿庭院内外，然后不留死角彻底清扫一遍，使里里外外整洁干净，既有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又使全家精神一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好像没什么，却能使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习以为常地养成一个勤劳、不敢懈怠的好习惯。滴水可穿石，铁杵可成针，习惯成自然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左传》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百姓的日子都在勤字上，只要能够勤劳，舍得辛苦，就不会没有衣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农夫果真能够辛勤耕作，那么即便有饥馑之时也必定会有丰收之年；商人如果能够老老实实存货，即便遇有积压也必定会有畅销之时。总之一句话，只要勤劳肯吃苦，就一定有饭吃，有幸福的生活。

勤能致治。“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为官箴言。元朝有一本很有名的《吏学指南》，教授为吏之道，此书将勤看成是官吏的重要品质，“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呈押文字，发遣公事，务为敏速，耻犯稽迟；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清朝《居官镜》也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官员一心为公，屏除杂务，勤于政事，从早到晚毫不懈怠，使事无积滞，则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万民安乐。

宋代政治家、思想家真德秀认为“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官员一日不勤，就免不了要受蒙蔽，而一贯懒散无为，尸位素餐，就会积弊丛生，问题百出，使许多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懒政是要不得的。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成就不朽伟业者，未必有过人之智，但必有过人之勤。正所谓天道酬勤，一勤天下无难事。

◇汉字里的故事◇

说说“福”字

●孟德宏

“福”字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字。对中国人来说，最理想的尘世生活是“幸福”，行好事、做好人是积德“修福”，有机会吃到美味是“有口福”，买彩票能幸运地中奖那是“有手福”，没有烦恼忧愁的生活就是“享清福”，如果还因此而胖了身体那就是“发了福”，人们彼此最美好的祝愿就是送上“祝福”，送上什么“祝福”呢？无非就是“福气满满”“福运连连”……可以说，诸多由“福”构成的词语，寄予着人们相互之间最良好的祝愿和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憧憬。

“福”从示畐声。历代学者对于这个声符的认识和解释不尽相同。“畐”是一个声符，也是一个义符，这一点大家基本没什么疑问。主要的分歧在于“畐”的原初意象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个大腹便便的“畐”符其实就是“腹”的初文，其中的“十”字花，跟“果”字里那个“田”的“十”一样，表示“充满”，所以“畐”就是“腹满”之义，也就是吃得饱饱的样子；另有学者认为，“福”字金文形体为“一个谷仓的象形”，其中，在谷仓的内部有一个“十”符，表示“谷仓已经满了”，因此，“福”的字形，其实是“仓廪实”之义；还有的学者指出，金文里的“福”字，是双手捧“尊”于“示”前之形，后来，该字形中的“双手”被省去，只剩下了“尊”与“示”，所以，“福”字中的“畐”其实就是这个“尊”的变体。

很长时间以来，能够吃饱穿暖是中国人基本的生活目标。所以，把“畐”解释成“吃饱饭”的样子，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仅仅是吃饱了饭就是“福”，给人的感觉是“有福”未免限定过低。中国最传统的“酒”是用粮食酿造的，能够有粮食进行酿酒，一定得是“吃饱了”之余才能进行。所以，我个人认为，后两种解释、尤其是最后一种解释，从逻辑上来说更可信一些。

“酒”这种东西，古时因为太金贵了，所以首先是用来“敬神”的，并由此而形成了各种祭祀形式，“酹”“醮”等字就是典型代表。我认为，“福”的字形传递出的是“以酒（畐）敬神（示）”，进而获得“神的护佑”之义。由此，“福”的第一个义项应该就是“祭神所用的酒肉”之义，这个意思在“福食”“福酒”“福物”中依然清晰可见；提供酒肉敬神，目的在于获得神的护佑，所以，“护佑”“获得护佑”自然就是“福”所应该具备的另一个义项了。“福荫”“福佑”“赐福”等词语中的“福”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护佑”之义是“福”很早就被人们意识到了。《说文解字》中说，“福，佑也……本作祜”。清代学者段玉裁的注进一步对此解释说：“福者，备也。”由此可见，“福”必然离不开“佑”，离不开“备”。无论是“佑”还是“备”，说到底，也就是物质生活有保障。“福”字告诉我们，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是“幸福”的最基本保证。也许，这就是先人透过“福”字传递给我们的最朴实的生活真谛吧。

第三章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4）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园地